

復出與引退：丙午年間張元濟宦跡探微

楊巍巍

〔提要〕 1906 年的短暫復出，是戊戌以後張元濟為數不多的仕進之舉，此段經歷對其影響甚大。張元濟此次復出，應是在學部奏調之下促成，並不能歸於瞿鴻禨的直接召喚，而立憲改革的時代氛圍則是其復出的深層誘因。在京期間，張元濟提出的外務部人事革新主張引起極大爭議，並因此遭到長官同僚的指責，這成為他告假南歸的主要原因。其中張元濟與唐紹儀之間的矛盾，既包含著見解之爭，又夾雜著人事之爭，更關聯著政治集團的較量。張元濟南歸以後，外務部多次催促其來京供職。為擺脫外務部的牽擾，張元濟遂向學部奏請出洋考察，並在獲得學部堂官同意後重返京城。但進京後張元濟卻未能如願出洋考察，其人不僅再次遭到同僚非難，還面臨捲入政治集團鬥爭的風險。於是他迅速抽身南下，並辭去各項官職，從此絕意仕途。丙午年間張元濟的復出與引退，某種程度上也是預備立憲前後士人與清廷離合的縮影。

〔關鍵詞〕 張元濟復出 預備立憲 晚清政治集團 學部 外務部

〔中圖分類號〕 K25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2 - 0183 - 11

庚子以後，士人與清廷之離合是影響政局走向的重要因子。丙午（1906）年間，五大臣出洋考察歸國及清廷宣布預備立憲，成為影響士人與清廷關係的重大事件。恰在這一年，早已告別官場的張元濟重新復出，卻又在官場勾留數月後再次引退。丙午年間張元濟在政界的短暫經歷，為觀察這一時期士人與清廷的關係提供了一個可分析的樣本。

作為近代重要人物之一，學界關於張元濟的研究成果頗為豐碩。但既有研究對於張元濟丙午年間的為官經歷卻較少涉及，或有論及也都止於概述。^①近來，有學者依據《張元濟全集》對丙午年間張元濟在京活動及去職因由做了粗略梳理。^②不過，由於史料相對單一，文章所論難免有若干史實錯誤，且對其第一次離京返滬因由、與唐紹儀意見不合、第二次北上入京因由等重要問題也缺少相應分析。有鑑於此，本文擬在既有研究基礎上，綜合檔案、全集、信札、報刊、筆記等多種史料，對張元濟丙午年間官場勾留的相關行跡予以考訂，著重分析張氏兩次進京和離京的多重緣由，希冀為理解預備立憲前後士人與清廷之關係提供幫助。

一、立憲的誘惑：復出

1905 年 12 月，清廷在中央設立學部，專管全國教育事務。新部設立，需才孔亟，未幾，學部即

奏調張元濟進京佐理部務。對於學部的奏調，張元濟卻頗為猶豫。在給友人汪康年的一封信中，張元濟寫道：“學部奏調，弟意不願入京，然亦未決。”^③所謂“不願入京”，大概出於兩個因由：

其一，張元濟對清廷相當失望而無意仕途。經戊戌、庚子兩變，不少士人對清廷極為不滿。如陳三立在1901年的《靖廬述哀詩》中提到“維彼誇奪徒，浸淫壞天紀。唐突蛟蛇宮，陸沉不移晷”，將以慈禧為首的清廷諷刺為“蛟蛇之宮”。^④因戊戌案而獲咎的張元濟同樣對清廷不滿，在與友人的交流往來中多有流露，直陳清廷所舉新政不過“係急抱佛腳”、“仍是諱疾忌醫”。^⑤正因如此，張元濟早已倦於仕宦，並曾婉拒了其座師軍機大臣瞿鴻禨的復出邀約。^⑥故學部調令下後，張元濟的“不願入京”不應看作是一般士人的謙讓姿態。彼時的張謇、湯壽潛、蔡元培等人也無意於功名仕進，他們或投入實業，或投身教育，或捨身革命，在官場之外尋求新的救國之路。而加盟商務印書館，則是張元濟試圖以出版事業來“昌明教育，開啟民智”的救國選擇。

自1902年加入商務印書館後，張元濟積極從事“最新”教科書的系列編纂工作，並獲得巨大成功，商務印書館也由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型印刷廠一躍成為全國重要的出版機構。是時，張元濟對在商務印書館的工作狀態頗為滿意。1904年其致函汪康年稱：“弟近為商務印書館編纂小學教科書，頗自謂可盡我國民義務。平心思之，視浮沉郎署，終日作紙上空談者，不可謂不高出一層也。”^⑦認為編纂教科書比在京做官還有價值，可見張元濟在商務印書館獲得了人生志業的舞台。因此，面對學部突如其來的調令，張元濟自然是頗為猶豫。故而，對商務印書館事業的熱愛是張元濟“不願入京”的另一因由。

不過，官場人事的變動往往關聯著更深層次的政治內幕。熟知官場隱性規則的張元濟自然希望弄清學部奏調背後的來龍去脈，以探明情況後再作打算。基於此，他遂請汪康年為其調京之事再為一探，“政府如何回答？原摺究作何語？統祈示悉，以便預籌對付之策。”汪康年先後於1906年1月15日、2月1日、2月8日連修三函寄給張元濟，目前基於史料的缺失，無法得知汪康年信中的具體內容。但張元濟在收到汪康年的信函後，經過一番慎重考慮，最終同意入京。在2月21日的覆信中，張元濟表示“學部奏調函電絡繹，敦促北上。此事究於前途關係至大，已允痔疾稍痊，即便就道。惟行期尚待定耳。到京之後，決不久留。如有人詢及，乞代宣布，弟不欲與人爭，不可不使人知我意也。”^⑧可見張元濟此時內心仍然十分糾結，既擔心自己的前途志業，又顧忌官場的人事紛爭，故而即便答應就職學部，也不打算在京久留。

關於張元濟的此次復出，不少研究者將其歸於瞿鴻禨的直接召喚。如汪家熔即認為張元濟“除了1906年因為瞿鴻禨，是他的‘受知師’，一再催促，師命難違，在學部和外務部曾呆過幾個月外，九年中多次被任命各種官職都堅辭不就，而從事為他人作嫁衣裳的編輯出版工作。”^⑨黃劍也稱張元濟是“在瞿鴻禨等人招募下北上，重返政界”。^⑩上述結論的依據不外乎時任軍機大臣瞿鴻禨是張元濟的座師，且瞿鴻禨曾在1904年通過汪康年勸說張元濟來京復出，加之此次張元濟又是向汪康年探問學部奏調內情，因而難免給人一種張元濟復出是由瞿鴻禨直接召喚的印象。

不過，在嚴修的追悼會上，陳寶泉卻指出：“（嚴修）所薦拔者，如張君元濟，范君源濂，林君灝深，戴君展誠，羅君振玉，劉君寶和，陳君清震等。泉之不材，亦與其列焉。”^⑪由於陳寶泉與嚴修關係極為密切，故這篇回憶文章頗具參考價值。^⑫關曉紅根據陳寶泉的回憶，認為張元濟是由學部侍郎嚴修舉薦而來。^⑬此外，關曉紅在論述學部尚書榮慶之時，還直接引用《蒙古鄂卓爾文恪公家傳》一文內容“及創立學部，公（榮慶）奏請開復廢員張比部元濟，調部任用。又徐編修仁鏡，以父子靜學士、兄研甫編修皆於戊戌獲重咎，久隱不仕，公亦奏調之，且再三敦促其入都供職焉”，^⑭以此來突

顯榮慶在用人決策方面的魄力和膽識。如此看來，張元濟此次復出似乎又是學部大臣直接奏調的結果，而不同於瞿鴻禨的召喚之說。結論的分歧預示著問題的複雜性，關於張元濟復出因由實有重新探討的必要。

在1月19日寫給汪康年關於學部奏調的第一封信中，張元濟開篇即稱：“久未通訊，伏維動定多福。”^⑤可知張元濟、汪康年二人已相當一段時間沒有聯絡，加之此信目的是向汪康年打探學部奏調內情。據此推斷，瞿鴻禨召喚之說的可能性不大。蓋1904年瞿鴻禨邀約張元濟復出之時，是先通過汪康年徵詢其意見，在其明確表達不願出仕的意向後，瞿鴻禨便沒有進一步強求，清廷更無相關政令發出。而此次學部奏調在政府明令發出後，張元濟仍不知其中內情，可推斷性格謹小慎微的軍機大臣瞿鴻禨並未提前聯繫張元濟。張元濟之所以向汪康年打探學部奏調內情，實因二人兼有同鄉、同門之誼，更曾在維新運動、滬甯鐵路、滬杭甬鐵路等事務中密切協作，私交深厚。尤其是作為清末著名的報人，汪康年消息極為靈通，因此張元濟在得到學部奏調的消息後，才會第一時間向同為瞿門弟子並在京任官的汪康年探詢內情。綜上所述，張元濟復出顯然並非出於瞿鴻禨的直接召喚。

在寫給汪康年的信函中，張元濟迫切想知道政府如何作答，原摺究作何語。據《清實錄》記載，學部尚書榮慶以“編纂教科書頭緒紛繁，擬調已革刑部主事張元濟分任纂校，並請予開復。得旨，張元濟著准其開復原官”。^⑥可知學部是以編纂教科書的名義奏調張元濟。而據當時的報紙記載，編纂教科書確實是學部成立之初的三大要政之一。^⑦在張元濟答應赴京及進入學部後，教科書編纂審定工作一直在持續推進。可見學部確實有編纂教科書的需求，而張元濟在商務印書館所取得的成就正好能夠為這一需求提供助力。是時，學部為充實學務人員，起用了不少“戊戌案內被誣人員”^⑧，張元濟僅是其中之一。據此推測，張元濟的復出應是在學部直接奏調之下促成。除此之外，是否另有其他因素影響，還有待於更多的相關史料予以補充。^⑨

拋開外部的舉薦之說來看，當時的立憲氛圍應是張元濟願意復出的深層次因由。早在維新運動期間，張元濟即有革新政制的主張。退居滬上以後，張元濟常與張謇、湯壽潛、趙鳳昌、鄭孝胥、張美翎、汪康年等人交談互通，逐漸形成立憲救國的思想。而日俄戰爭的刺激，則使張元濟等人積極探索立憲實踐之道。因此，早期無論是從事教育出版事業還是創辦《外交報》，均可視為張元濟以啟發民智來為政治革新所做的準備。而創辦《東方雜誌》和組織人員編譯《日本法規大全》，則可看作張元濟為立憲運動營造氛圍的努力。不僅如此，這一時期張元濟還直接參與到立憲運動中。日俄戰爭期間，張元濟與張美翎等立憲士人一面提出派遣大臣考察各國政治的主張，一面策動督撫岑春煊、樞臣瞿鴻禨等人奏請立憲。^⑩因此，清廷是否立憲成為影響張元濟出仕的關鍵性因子。

1904年3月在給友人趙鳳昌的信中，張元濟談到：“至舉行新政，係急抱佛腳，然亦有表裡相應之道，似不可缺。朝廷真有悔禍求生之意，何事不可舉行？若猶未能，則仍是諱疾忌醫，必至無可救藥。”^⑪其中所謂的“表裡之道”，即應在編練新軍、獎勵實業、興辦學堂、選派留學生等舉措之外進行政治改革，而“何事不可舉”即有呼之欲出的憲政改革訴求。因此時尚未看到清廷有實行憲政改革的決心，故張元濟才會在當年婉拒乃師瞿鴻禨的復出邀約，進而發出“如今時勢，斷非我一無知者所可補救”^⑫的負氣之言。

而在學部發出奏調之令的1906年，立憲運動逐漸進入新的階段，清廷先後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促使士人對於立憲政治抱有強烈的期盼。張元濟在與汪康年等人的溝通往返中，亦可能揣摩到朝堂之上尤其是清廷內部對於立憲的態度，這讓他重燃政治希望，故有進京一探的打算。是

以，張元濟此次復出，不僅是外界舉薦勸說的結果，更是立憲的時代氛圍促使他重新踏入官場。

二、失意的抽離：南歸

3月下旬抵達北京後，張元濟並未直接到學部報到，而是先行拜訪汪康年等人，既是敘舊，亦是論事，更可能為來京之後的舉措預為謀劃，及至31日方到職。因頗受學部堂官重視，故而能夠與聞機要。是時，學部“乃新成立者，凡重要文件，多由羅振玉起草，張元濟、李家駒、范源濂、陳寶泉等參與意見，幾經修改，然後取得榮尚書同意，始能決定奏發”。^②事實上，張元濟也草擬了一些如《學部辦事章程》等重要文件。^③除辦公時間外，張元濟還多次私下與嚴修等人晤談。在嚴修等人的信任下，張元濟頗欲有所作為，先後擬具《獎勵捐款興學議》、《議改良留學日本辦法》等各類公文十多份。^④

張元濟入職學部“未及兩旬，復蒙外務部奏調，並請以員外郎補用”。^⑤然而，不僅張元濟本人不願接受調任，學部堂官私下亦不肯應允。學部中人“請其至外部稟辭”^⑥，張元濟遂呈請外務部“收回成命”^⑦。不過，他的請辭並未成功。學部本擬出面奏留，“又因該主政為總理衙門之章京，係屬舊署，未便爭執”^⑧。但清廷也洞悉其中隱情，下旨讓張元濟兼職兩部，既供職外務部，又歸學部差遣。

清末外務部雖位列中央各部之首，內部卻相當腐敗。張謇即稱“窺外務部諸人者，昏而懦”。^⑨辜鴻銘在給光緒皇帝的奏摺中則進一步論到：“臣觀今日內外大臣所用一般辦理外事之員，率皆樹立私黨，非其舊屬故吏，即係採聽虛聲，羅致門下，彼此藉以自固。故奔競夤緣者，易以幸進，而賢能廉退之士，反無自而升。此外事所以日形荊棘，幾幾乎無從下手者，職是故也。”^⑩報刊也常以《論外務部內容之腐敗》、《外務部推諉》^⑪為題而對其予以批評，這也是張元濟不願入外務部的原因之一。而外務部堂官也並非不知內部之積弊，故有儲才館^⑫之議，擬從人才培養方面除舊布新。張元濟到外務部後，主要活動就是圍繞儲才館事宜而展開。

張元濟獲准在外務部、學部兩部兼差的時間是在4月25日，但據《張元濟年譜長編》記載，他5月份活動的重心似乎仍在學部^⑬，其實不然。大約在5月中下旬，張元濟已有《條陳外交學堂事宜說帖》、《條陳外務部事宜稿》^⑭等文稿上呈外務部堂官，內容就是圍繞外務部人事革新而發。6月4日，張元濟被正式任命為儲才館提調，不料未及兩旬即告假南歸，匆匆出京。關於張元濟請假離京的原因，其自述是“因與唐紹儀意見不協”^⑮，學界以往研究亦多以此為據。也有學者引用張元濟寫給瞿鴻禨的信函“惟長官未盡融洽，同列復多猜嫌”^⑯，用來說明張元濟辭職的緣由^⑰。但張元濟因何與唐紹儀意見不合，又因何遭到同僚猜忌，既有研究大都語焉不詳。筆者綜合各類資料，擬就此問題試作分析。

張元濟在外務部期間，先後擬就《條陳外交學堂事宜稿》、《條陳外務部事宜稿》、《代外務部擬辦理儲才館事宜奏摺》、《儲才館暫行章程》、《儲才館辦事章程》、《儲才館學習員章程》等公文。其中，前3份主要陳說主張，大意是“將本部丞參或調或放，郎員以下多放外官而廓清之，另調熟悉（外國）語言文字之人入部辦事”。^⑱將外務部堂官以下人員皆為疏通他調，他的這一主張不可不謂過於激進。^⑲至於張元濟為何提出這一主張？他在條陳中稱：“本部司員現計五十餘人，以後新到署必閱四五十年方能得一記名道府。升途過隘，策勵為難。前列者以積久而疲，新進者以難進而懈，甚非所以用人之道也。功名之士亟思自奮，若令浮沉郎署，必至裹足不前。且時局日新，事變日幻，亦斷非現在各員所能勝任愉快。雖在僚友，無可諱言。為將來計，不可無獎勸之方。”在張元濟看

來，疏通舊有人員是為了吸引功名之士，這樣國家才能得人而治，故而需有此破格之舉。或許意識到可能引發的非議，他在條陳末又加以解釋：“右之所言並非好為其難，蓋實深痛本部腐敗情形，不能不為此正本清源之策，而又有感於堂憲納諫之誠，望治之切，故不辭越俎之嫌，而瀆陳如右。”^④然而，其主張被披露後還是引起極大爭議。

《北京日報》是較早關注張元濟條陳的報紙，該報即認為“此議似是而實不然”，並指出“外部人材固然用不著蔽塞迂陋等輩，然一旦廓而清之，恐頭緒茫然，接手亦絕不易也”。^⑤上海的立憲派報紙《時報》也指出，“以今日新舊遞嬗青黃不接，海內全才能有幾人？若用此說，恐必窒礙而難行也”^⑥。張元濟的主張不僅受到外界質疑，就連友朋也頗為不解。在聽說張元濟奏調外務部的消息後，同鄉同門好友汪大燮起初頗為興奮。他在給汪康年的信中表示：“菊生到京，聞外務部奏調留部，自必有所建白，能無阻力否？外部改良，各使館改良，外交方有起色。事急矣，誰歟成此大功者？”“菊生入京，聞有條陳外部改良事，能行否？已行否？外部不改良，使館不改良，則外交終無起色。”^⑦及至得知張元濟的具體主張後，汪大燮連連歎道：“何以菊生思想亦如此淺薄耶？真不可解。”“惟其望學生亦太過，學生即好，亦尚須陶鎔，況學有成者甚鮮耶！其始與以重資，恐後難為繼。”^⑧朋友尚且質疑，更何況外務部將被疏通的各位司員。於是，反對者竭力運動。當時報載：“外部各司員公呈那協揆（那桐）請轉求慶邸格外體恤，酌予變通辦法，若允照張部郎條陳施行，則各司員無論實缺候補均情願一律告退。聞那協揆之意亦不以張部郎條陳為然，因面屬各司員將所擬公呈自行赴慶邸呈遞，一面由協揆代為轉求。”^⑨這或許就是張元濟所說的“惟長官未盡融洽，同列復多猜嫌”。

至於張元濟自述與唐紹儀意見不合，有學者對此亦頗感困惑，但其中隱情至今未有揭示。^⑩若從當時的政治大氣候和外務部的小氣候分析，或有助於對這一問題的認識。

陳寅恪曾以清流與濁流之分來審視晚清政治：“至光緒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鴻禨、張之洞等，外官以陶模、岑春煊等為清流；京官以慶親王奕劻、袁世凱、徐世昌等，外官以周馥、楊士驤等為濁流。”^⑪作為一種大體把握晚清政治的分析思路，陳寅恪的見解廣為後世學人引用。庚子事變後，朝堂之上確實逐漸形成以瞿鴻禨為領袖的清流勢力和以奕劻、袁世凱為代表的政治集團。1906年以後，兩派圍繞預備立憲和中央官制改革明爭暗鬥，終致釀成清政府內部的一次重大政治風波——丁未政潮。在這一政治格局之下，瞿鴻禨將張元濟奏調到外務部的舉動極具深意，蓋時任外務部右侍郎唐紹儀即出身於袁世凱幕府。因之，即便當事二人無意衝突，在朝堂政爭之下亦難免有所摩擦。

再就外務部而言，當時該部由領班軍機大臣奕劻為總理大臣，軍機大臣瞿鴻禨為會辦大臣兼尚書，滿人那桐為會辦大臣。唐紹儀雖僅位列右侍郎，卻因出色的外交能力^⑫而深受奕劻等人信任，隱然為外務部實際主持之人。據盛宣懷的京城坐探陶湘觀察，唐紹儀曾得到慈禧口諭：“外部事應由汝當家，好好辦事。”於是“外部之事必三藏（唐紹儀）畫諾後方定”。^⑬就連當時的報紙也稱“除慶邸外，唐紹儀氏幾為外務部中第一人，行事俱可獨斷”。^⑭此時的唐紹儀“內附奕劻，外倚世凱，權勢震一時。凡使臣之更迭，外任之選補，恒多所薦引，朝端皆側目焉”^⑮。而在外務部勢力相對薄弱的瞿鴻禨對於唐紹儀“平日意氣”尤為不滿^⑯，故有強行奏調張元濟入部之舉，以為其助力。

其實，關於儲才館的籌設還是唐紹儀的主張。大約在4月中下旬，唐紹儀就建議“以外交需才孔亟，所有本部章京即經奏明不復以文字考取，自應設立外交館造就人才”。這一提議獲得各大臣應允後，奕劻即“在部提議此事，催令會訂開辦章程及籌款辦法”，並擬調朱有基為該館總辦。^⑰朱有基是晚清大臣朱鳳標之孫，得祖父餘蔭被欽賜舉人，早年在同文館學習，先後充任內閣中書、同文館

提調、總理衙門章京等職，曾得奕劻保舉而被召見，時任外務部郎中。^⑤據此推斷，朱有基在政治上接近奕劻一系。當時報載：“外部奏設外交館，原擬緩圖。現在某侍郎以速為開辦造就人才為宗旨，故已派朱伯平丞堂有基為該館總辦”。^⑥基於儲才館是由唐紹儀提議而籌設，而唐氏在外務部的地位又相當特殊，因此報章中的“某侍郎”應是指唐紹儀。故調派朱有基為儲才館提調一事，應是唐紹儀向奕劻舉薦的結果。而在張元濟入外務部以後，外間又傳言其曾謂“部中人員如朱有基輩有何用處等語”。結合儲才館提調最終由張元濟接任，所以傳言背後還折射著職位之爭。此外，若依張元濟的主張將丞參以下人員他調，一定程度上也會削弱唐紹儀對外務部的掌控，故唐對於張的主張定是不以為然。由此看來，唐紹儀與張元濟之間的矛盾既包含著見解之爭，又夾雜著人事之爭，更關聯著政治集團的角逐。其時，張元濟的處境已相當惡劣，外間謠言紛紜，竟有“謂張元濟有外部堂官之望云”^⑦，這難免讓人聯想到其有借改革而謀私人之位的嫌疑。加之張元濟離滬之前曾多次申明不會在京久留^⑧，故尚未被正式任命為儲才館提調以前，即已萌生去意。^⑨6月14日，張元濟在向學、外兩部堂官請假後，離京南歸。

三、希望的幻滅：北上與引退

對於張元濟的告假南歸之舉，友朋們大都表示理解和惋惜。汪大燮認為“菊生在外難得手，不來亦未始非法”。^⑩葉崇渠則感歎：“菊公已出都，所言未見施行，殊可怪歎。”^⑪在張元濟離京以後，其關於疏通外務部司員一節，“因反對此議者竭力運動，故已作罷論。但擇一二無勢力、無要差之司員酌量改官以為敷衍，並將各項緊要案卷抽調而各藏其案由以為要挾之具。”^⑫在後續給嚴修、瞿鴻禨等人的信中，張元濟也自謂是“從公三月，毫末無裨”、“趨承左右，建樹毫無”^⑬，雖然多少帶有自謙的成分，也有借此表露自己在京的不得志。所以張元濟雖是告假南歸，卻已有引退之意。

回到上海大約一個月以後，張元濟在致嚴修的信中謂：“初意本不欲久居京華，重以折足復足之懼，故屢承慰留，而終思引退。”^⑭顯然，戊戌黨禍給張元濟留下深刻教訓，故思之良久，還是打算引退。不過，外務部以儲才館開辦在即，屢次“電促該員速為回京供差”^⑮。在此情形之下，張元濟一面以“才力實不及”^⑯，請求外務部另派提調；一面設法謀求出國考察，藉以擺脫困境。

鴉片戰爭以後，國人逐漸意識到向西方學習的重要性，而出國遊學遊歷是接觸西方文明的重要途徑。作為清末開新士人之一，張元濟早在戊戌變法之前就已有出國遊學的想法。1896年，在黃遵憲等人的影響下，張元濟出國“遠遊風志，至此益堅”^⑰。1898年3月，張元濟在給汪康年覆信中再次提到“勸赴東洋肄業，極合鄙意。惟家室累我，未知何日方能成行耳”^⑱。退居上海以後，張元濟也一直未曾放棄外文的學習，以為將來出國做準備。清末新政時期，朝廷將出國遊學遊歷視為造就人才之要端而格外獎勵。1906年，學部又有選派翰林出國遊學遊歷之舉，令不少趨新士人深感振奮。如蔡元培在得知“學部有資送翰林遊學東西洋之舉”後，頗為心動，並稱“數年來視百事皆無當意，所耿耿者惟此遊學一事耳。”^⑲推而論之，張元濟在聽聞該消息後亦應有所心動。8月初，以黃紹箕為首的各省提學使赴日考察團在上海集中，張元濟得與汪詒書、沈曾植等友人相聚，其中葉爾愷就住在張元濟家中。^⑳是月中下旬，學部右參議林灝深等人也經上海赴日本考察學務。^㉑或是在與舊友同僚的交談中，張元濟再次萌生出國遊歷的打算。尤其是林灝深等人皆是部中“向未出洋者”^㉒而經學部選派前往考察，這讓張元濟看到了出國的希望。^㉓9月初，張元濟正式向學部提出遊歷日本的請求。

9月25日，學部覆電張元濟：“來函云當遊日本，擬即奉煩會同林朗溪考察東西洋學制，由日而

美而歐，並周歷南洋，察度華僑興學情形。”^⑭此後，張元濟與學部左丞喬樹枏、右丞李家駒等函電往返數次，商討出國遊歷細節。張元濟在信中表達了強烈的出國意願：“南洋群島華僑眾多，興學訓民實為本部應盡之職。至留學歐美，往者品類攸殊，防護維持，尤不容緩，弟於此事極願勉效馳驅”。^⑮不過，由於妹夫馮通伯剛剛病逝，張元濟“尚須旋里為之經理喪葬，子女均幼，一切家政尚待綢繆”，因之“屈計東渡之期總在初冬時節”。^⑯在此期間，外務部又多次電催張元濟回京供職。故在諸事安排妥當以後，張元濟遂於11月30日北上入都。

值得注意的是，在張元濟入京前，唐紹儀剛被瞿鴻禨排擠出外務部，其遺缺右侍郎一職由汪大燮接任。同時，在11月份的中央官制改革中，鹿傳霖、榮慶、徐世昌、鐵良等人被開去軍機大臣職，滿人大學士世續及由瞿鴻禨推薦的林紹年得入軍機處。11月20日，清廷又奏准袁世凱開去各項兼差，交出陸軍第一、三、五、六四鎮軍權。可以說，在與奕劻、袁世凱為代表的政治集團的較量中，以瞿鴻禨為首的清流勢力暫處上風。張元濟選擇在此時入京，或與朝中政治形勢變化相關。

張元濟抵京以後，先到學部拜會嚴修，兩人相談甚久，內容涉及南洋興學辦法。^⑰12月13日，拜謁慶親王奕劻，奕劻以儲才館開辦在即，令其“將應調員生開單呈覽”。次日，張元濟即將名單開出，保舉伍光建、溫宗堯、嚴璩、夏偕復、容揆、戴陳霖、文惠、李家鏊、陳錦濤、董鴻禕、張煜全、王寵惠、嚴錦榮、薛頌瀛等十五人。^⑱其後，又撰擬《議覆〈駐法劉大臣奏請變通出使事宜〉》、《上外務部尚書條陳》等公文，就駐外使節人選資格及儲才館事宜提出意見。1907年1月12日，奕劻命張元濟即日開辦儲才館。13日，張元濟即擬訂《籌劃開辦儲才館事宜說帖》一文，將儲才館開辦事宜預為籌劃。不料，張元濟突然在15日離京返滬。

關於張元濟此次離京的原因，他在後來與師友的信中有所表露，也有學者據此加以分析，^⑲但因史料相對單一，所論不免失之於簡。實則張元濟在入京前曾致函盛宣懷：“元濟蒙學部相公派赴東瀛，考察學務，又奉外部邸堂一再電飭入都面商。”^⑳結合前文所述可知，張元濟此次入京的主要目的在於出國考察學務，並借機交接外務部儲才館之事，故其進京以後首先到學部拜會嚴修，論及南洋興學辦法。然而，張元濟出國考察之事似乎未能獲得外務部堂官的同意，此後他也一直被外務部諸事牽絆。本意既不能達，故有離去之意，這是張元濟離京的第一個原因。其次，張元濟關於儲才館所調員生等主張遭到內部人員的反對。據報紙披露，張元濟在將名單開列後，“乃某侍郎與伍（伍光建）、溫（溫宗堯）二人有隙，必欲撤去，張君力爭不允”。^㉑這也得到張元濟本人的證實，他在致瞿鴻禨、林紹年的信中反復提及“去歲調員之始，事機不順，風聲所播，羅致愈難”。“儲才館調員之始，復有阻力，風聲所播，羅致愈難。”^㉒可見此事頗令張元濟不滿，故耿耿於心甚久。此外，張元濟先前草定的儲才館章程也遭變通，以後所調“學員資格不必過嚴，除搜羅外國遊學生及久辦交涉人員入館學習外，本國學堂普通畢業生有能通曉外國語文者，皆可廣搜入館肄業”。^㉓凡此種種，皆令張元濟極為不快，這也是促其離京的第二個原因。復次，官場多是貪圖利祿之輩，張元濟不願與之為伍。當時正值中央官制改革之際，投機鑽營之徒競相奔走，“北京則已成為大運動場”。^㉔因而不少有志之士對於官場避而遠之，遠在英國充任使臣的汪大燮在給汪康年的信中就表示：“兄從前歸念甚切，然得侍郎之後，反覺游移”，“當此京官爭競之際，兄以孤根，如何能立，暫躲一躲，亦未嘗不好也。”^㉕張元濟同樣抱此看法，在儲才館擬調員生受阻之後，他即認為此後“賢者必不肯來，而來者志在利祿，所謂國家思想渺無所知。若輩在官，安能與之共事！既食其祿，不能不盡其職，元濟一身精力幾何，館事已不能勝，其於部務更有何益。明知於事無裨，而虛與委蛇，問世問心，能不自疚！與其空言無補，有負列憲委任，何如早自引退，免致素餐之譏”。^㉖可以說，官場黑暗污濁是張元濟離

京的第三個原因。

除上述因素外，朝中政爭是促使張元濟離京的深層次原因。其時，清廷內部所推行的官制改革，實際上也是一次政治權力的重新分配，各方勢力圍繞這一改革不斷明爭暗鬥。洞悉政治隱情的汪大燮即稱：“改官制事，非變政，實鬥法，此人所共見。”^⑧朝中政治詭譎多變，各種傳聞不斷。慶親王奕劻因腿疾請病假，外間“傳說甚危”^⑨，以致汪大燮急切地向汪康年詢問：“慶病聞甚重，設有不諱，此席當屬何人？此事極要，弟曷思之？能逆料否？”並主動推薦載澤，蓋“以其人嗜慾少，可免貪患而有韌力也”。^⑩對於外間各種傳聞，身在京城的張元濟自然知悉。且因與瞿鴻禨的師生關係，京中關於張元濟的非議亦復不少，朋友形容是“群疑眾謗”^⑪。同時，張元濟聽聞“鐵良將復入軍機”，故判斷“瞿子久（瞿鴻禨）將不能自固，京都情形視上半年更加黑暗”。^⑫因此，為了避免重蹈戊戌年間的覆轍，張元濟遂有突然離京之舉。

綜上所述，張元濟二次入京的體驗使其僅有的政治希望徹底幻滅，故這次離京明顯帶有引退之意。此後，無論是瞿鴻禨本人還是同一陣營的岑春煊、林紹年等人的函電催促，張元濟均托詞不就，並辭去各項官職，從此淡出官場。^⑬

結語

戊戌政變以後，張元濟雖因牽連獲咎而退居滬上，但他並未置身時局之外，而常遊走於封疆大吏之間，冀能裨益於時事。他在致盛宣懷函中自白：“元濟還謫餘生，本不當再談國事，惟既生此土，終覺未能忘情。”^⑭國家民族危亡之下，傳統士人心懷天下的精神仍然是張元濟立身處世的內在特質。在東南互保、立憲運動、滬杭甬鐵路運動等活動中，張元濟皆有謀劃策動。不過，這一時期的張元濟雖然關心時局卻無意於仕途，並曾多次拒絕瞿鴻禨、岑春煊等人的復出邀約。因之，張元濟在丙午年間的短暫復出就顯得極為特殊。對於學部奏調之事，張元濟自言“此事究於前途關係至大”^⑮，投身於教育與沉浮於宦海確實是兩種不同的人生軌跡。躊躇月餘後，張元濟還是決定進京觀望一番。入京後先是在學部供職，但不久即被奏調至外務部兼差。期間，因涉及外務部人事改革，他的革新主張引起極大爭議，部中人員極力阻撓。在“長官未盡融洽，同列復多猜嫌”之下，遂萌生去意，告假南歸，前後在京時間僅兩個多月。不過，他離京不久，外務部即多次來電催促。為擺脫外務部的人事紛爭，張元濟於是向學部奏請出洋考察，在獲得學部堂官同意後才重返京城。但進京以後，其出洋考察的意圖並未如願，提議之策也再次遭到同僚反對，而其本人也即將捲入政治集團鬥爭的漩渦。再次目睹官場的黑暗和政治的險惡後，張元濟迅速抽身南下，懷著失望之情告別了短暫的仕途之旅。

丙午年間，張元濟的為官經歷也折射出他對清廷的心態變化。學部奏調之初，正值五大臣出洋考察之時，立憲改革的時代氛圍讓張元濟對清廷重燃希望，並願意重新復出。但短短幾個月的官場經歷，讓他對清廷徹底失望，並在心理上表現出一種疏離的態度，這在他寫給瞿鴻禨、林紹年的信函中皆有表露。後續清廷又提拔張元濟為郵傳部左參議，但他仍然堅辭不受，依舊表現出對清廷的離心之態。進言之，張元濟對清廷的態度，何嘗不是士人與清廷關係的縮影？

庚子以後，士紳階層與清政府的關係雖幾經離合，但大體趨勢是漸行漸遠。如世人眼中的名士代表張謇、湯壽潛等人多次拒絕清廷的招攬，若不是出於對清廷的極度失望，他們也不會放棄傳統上“學而優則仕”的百代人生價值追求。其時，張謇常有“朝政如此，可歎可歎”^⑯的感慨。不僅在野名士極度失望，就是在朝為官之人也對清廷不滿。汪大燮即稱“方今存亡呼吸之際，而當軸之

人，無論何事，皆如墮五里霧中”，批評朝政是“破船操舟者，尚不專心檢舵，而彼此以私嫌爭鬥”，進而憤憤道：“總之，今日是鬼蜮世界，舉朝之上，如糞窖內蛆蟲一般，活趨活嚙，不知鬧些什麼。”^⑧清廷本可借立憲之舉挽回士人對政府的向心力，然而，中央官制改革的結果卻令天下士人大失所望。汪大燮事後稱“立憲事殆如泡影”，而“滿漢見愈重，內閣之局已成”^⑨。徐佛蘇也向梁啟超抱怨，“政界事反動復反動，竭數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來面目。軍機處之名亦尚不改動，禮部仍存留並立，可歎，政界之難望，今可決斷，公一腔熱血，空灑雲天，誠傷心之事也。”^⑩就連陶湘也稱“立憲之舉，始而恢張，繼無消息，終成敷衍”。^⑪可見，無論在朝還是在野，無論海內還是海外，無論清流還是濁流，均對清廷立憲舉措有所不滿。此後，清廷行事愈發背離士人期許，雙方關係愈來愈疏遠，這或許是理解辛亥年間立憲士人革命轉向的關鍵所在。

①關於丙午年間張元濟北上進京的相關研究有柳和城：《張元濟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61~64頁；張人鳳：《戊戌到辛亥革命期間的張元濟》，上海：《史林》，2001年第2期；張學繼：《嗜書、藏書、出書的一生：張元濟傳》，北京：團結出版社，2018年，第92~95頁。

②參見黃劍：《甲辰開復後的張元濟與清末教育新政》，廣州：《中山大學學報》，2021年第5期。

③⑥⑦⑧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張元濟：《張元濟全集》第2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198頁；第196~197頁；第196~197頁；第198頁；第197頁；第196~197頁；第3頁；第170頁；第192~193頁；第452頁；第198頁。

④陳三立著，李開軍校點：《散原精舍詩文集》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7頁。

⑤㉑國家圖書館善本部編：《趙鳳昌藏札》第8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第262頁；第262頁。

⑨宋應離、袁喜生、劉小敏編：《20世紀中國著名編輯出版家研究資料匯輯》第1輯，河南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75頁。

⑩③⑧⑨黃劍：《甲辰開復後的張元濟與清末教育新政》，廣州：《中山大學學報》，2021年第5期。

⑪陳寶泉：《嚴范孫先生事略》，天津：《河北月刊》，1936年第4卷第11期。

⑫庚子以後，陳寶泉幾乎一直在天津協助嚴修推廣新式教育；1905年底又隨嚴修到學部任職。可以說，陳寶泉是嚴修清末教育活動的重要見證者之一。參見周川主編：《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人物辭典》，福

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369頁。

⑬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08頁。

⑭卞孝萱、唐文權編：《辛亥人物碑傳集》，北京：團結出版社，1991年，第686頁。該文作者王季烈自稱“光緒乙巳，蒙公奏調學部，日日接公言論”，其言說亦頗為可信。

⑯《德宗景皇帝實錄》卷五百五十三，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下甲辰，《清實錄》第59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332頁。

⑰《學部要政有三》，天津：《大公報》，1905年12月10日。

⑱《學部調員紀聞》，天津：《大公報》，1906年2月2日。

⑲就目前所見材料來看，張元濟的重新復出顯然不是瞿鴻禨直接催促的結果，但這並非意味著瞿鴻禨與張元濟的復出無關。從世情與人情而論，瞿鴻禨可能在學部奏調前後曾起到一定間接作用。當然，該推測還有待於後續文獻的佐證。

⑳參見侯宜傑：《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清末立憲運動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6~39頁。

㉑嚴修自訂，高凌雯補，嚴仁曾增編：《嚴修年譜》，濟南：齊魯書社，1990年，第186頁。

㉒㉓《嚴修日記》編輯委員會編：《嚴修日記》第2冊，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314、1316、1318頁；第1358頁。

㉔參見《嚴修日記》第2冊，第1317~1318頁。

㉕張元濟：《張元濟全集》第5卷，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8年,第561頁。關於此次外務部的奏調,應該與時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張元濟的座師瞿鴻禨有關。

②⑦《要聞:張部郎將辭外部》,天津:《大公報》,1906年4月21日。

②⑧③⑥⑦⑧張元濟:《張元濟全集》第5卷,第561頁;第605頁;第140頁。

②⑨《司員兼缺兩部》,天津:《大公報》,1906年4月29日。

③⑩李明勳、尤世瑋主編:《張謇全集》第2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年,第185頁。

③⑪辜鴻銘著,馮天瑜標點:《辜鴻銘文集》,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第6頁。

③⑫《來稿:論外務部內容之腐敗》,北京:《中華報》,1906年第436期;《外務部推諉》,上海:《新聞報》,1906年5月31日。

③⑬儲才館最初是以外交館、外交學堂等名義提出,最終則以儲才館之名成立。為行文方便,本文姑且以儲才館統稱之。

③⑭⑦⑧⑩張人鳳、柳和城編著:《張元濟年譜長編》上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02頁;第211頁;第212頁。

③⑮《張元濟年譜長編》認為該兩篇文稿寫於6月上中旬,此說不確。《條陳外務部事宜稿》所涉內容在5月20日前後已有報刊披露(參見《外部堂官有廓清司員之議》,北京:《北京日報》,1906年5月19日;《條陳廓清外部堂司續聞》,北京:《北京日報》,1906年5月20日;《電一》,上海:《申報》,1906年5月21日),《張主政條陳外部事宜稿》原稿全文也於6月1日由上海《新聞報》刊出。而就內容分析,《條陳外交學堂事宜說帖》的寫作時間應在《條陳外務部事宜稿》之前,《張元濟全集》的編者已考訂出時間為1906年5月(參見張元濟:《張元濟全集》第5卷,第123~124頁)。

③⑯⑥⑥③張元濟:《張元濟全集》第3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526頁;第660頁;第205頁。

③⑰《外部堂官有廓清司員之議》,北京:《北京日報》,1906年5月19日。

③⑱時人左紹佐即言:“張菊生元濟調入學部,又調入外務部,皆夷然不屑,竟有天馬不羈之致。”參見張人

鳳、柳和城編著:《張元濟年譜長編》上卷,第208頁。

④①《張主政條陳外部事宜稿》,上海:《新聞報》,1906年6月1日。

④②⑤⑦《條陳廓清外部堂司續聞》,北京:《北京日報》,1906年5月20日。

④③《電報一》,上海:《時報》,1906年5月21日。

④④⑤⑥⑧⑤⑧⑦⑨⑩⑪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7年,第763、769頁;第779、786頁;第774頁;第810~811頁;第804頁;第832頁;第812、820、817頁;第793頁。

④⑥《外部司員呈請變通張部郎條陳》,上海:《申報》,1906年6月1日。

④⑦如張學繼就對張元濟與唐紹儀不合頗感困惑,稱“張、唐衝突的內容現在還不清楚”。張學繼:《嗜書、藏書、出書的一生:張元濟傳》,第94頁。

④⑧陳寅恪:《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95頁。

④⑨唐紹儀的外交才能甚至受到汪大燮的讚賞。在寫給汪康年的信中,汪大燮誇讚“少川明決而有體有用,非秩庸(伍廷芳)可比”。“唐少川實當今外交最高等之人,有心思、有手段、不多見也。”參見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第759~760頁。

⑤①③⑧⑨陳旭麓、顧廷龍、汪熙主編:《辛亥革命前後——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5頁;第35頁;第35頁;第28頁。

⑤②《唐侍郎為外部之特色》,天津:《大公報》,1906年5月25日。

⑤③陸保璿輯:《滿清稗史·後函》,上海:新中國圖書局,1913年,第11頁。

⑤④《外部擬設立外交館》,上海:《申報》,1906年5月1日。

⑤⑤王煒編校:《〈清實錄〉科舉史料彙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937頁;《液池柳色》,上海:《申報》,1894年4月22日;《郎中履歷》,天津:《大公報》,1903年12月7日;《朱卓之履歷》,天津:《大公報》,1906年3月29日。

⑤⑥《外交館將開辦》,天津:《大公報》,1906年5月3日。

⑤⑦除汪康年外,張元濟離滬之前還曾向盛宣懷表示

自己僅在京勾留兩月左右，“麥秋節後當可南旋”。參見張元濟：《張元濟全集》第3卷，第209頁。

⑤⑨報紙在6月1日就有“張部郎有本月中旬即擬馳回上海”的消息，參見《外部司員呈請變通張部郎條陳》，上海：《申報》，1906年6月1日。

①①①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3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7年，第2234頁；第2696頁。

①②《外務部司員免職》，上海：《新聞報》，1906年6月21日。

①③張元濟：《張元濟全集》第2卷，第3頁；張元濟：《張元濟全集》第3卷，第526頁。

①⑤《外部將次整頓》，天津：《大公報》，1906年7月28日。

①⑦《滬江官事》，上海：《申報》，1906年8月3日。

①⑦《上海官事》，上海：《申報》，1906年8月16日。

①②《附奏派員出洋考察學務片》，北京：《學部官報》，1906年第3期。

①③清末出國留洋所需費用甚巨，嚴復曾向張元濟抱怨在歐洲生活困頓（參見王拭主編：《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555頁）；蔡元培出國遊學之念多年未能成行，主要原因就是資金不足；張元濟也認為“出洋遊歷，措資不易”（參見張元濟：《張元濟全集》第3卷，第660頁），故他希望能夠像林灝深等人一樣被學部選派出國。

①⑤①⑥張元濟：《張元濟全集》第1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389頁。

①⑧《紀儲才館最近之真相》，天津：《大公報》，1906年12月30日。

①②張元濟：《張元濟全集》第3卷，第526頁；張元濟：《張元濟全集》第2卷，第452頁。

①③《外部又催辦儲材館》，濟南：《山東官報》，1907年

第167期。

①④《記各部司員近情》，上海：《中外日報》，1906年12月19日。

①⑤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4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7年，第3431頁。

①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1073頁。汪大燮在聽聞鐵良將入軍機的消息後，也認為“鐵必謀去瞿而自代，甚可危也”。（參見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第828頁）而關於朝中政爭的觀察，早在1906年4月，汪大燮就曾判斷“鄙人且默觀大勢，恐都中不久將出亂子，不免有排山倒海之慮，但未知鹿死誰耳”。是年底，汪大燮在談及政局時，稱“以今情形觀之，其勢似難久常。三五月變動之說，自在不免”。（參見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第762、821頁）身處上海的鄭孝胥也注意到朝中“朋黨兆已萌”。（參見鄭孝胥著，黃坤、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63頁）故此時身在京師的張元濟對於朝中政爭的體認更為深刻。

①②張元濟：《張元濟全集》第3卷，第526~527頁；張元濟：《張元濟全集》第2卷，第115、452~453頁。

①⑤李明勳、尤世瑋主編：《張謇日記》，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年，第608頁。

①⑧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68頁。

作者簡介：楊巍巍，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博士。杭州 200444

[責任編輯 陳志雄]